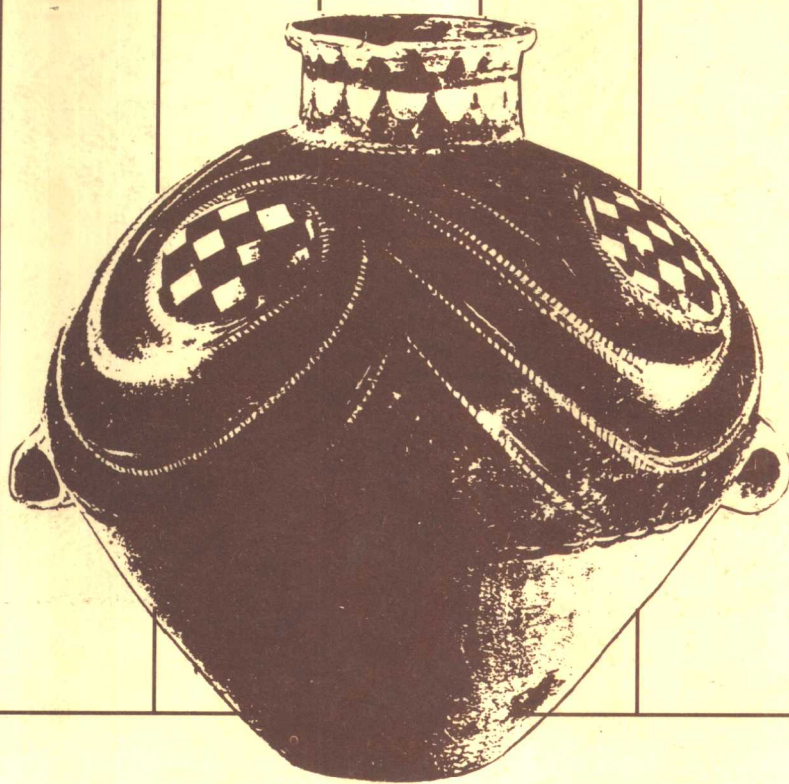


李水城 著

半山与 马厂 彩陶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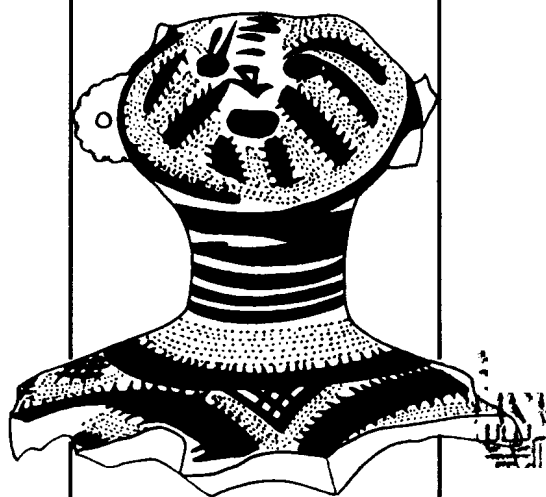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水城 著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半山与马厂 彩陶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一九九八年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李水城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2

ISBN 7-301-03767-8

I. 半… II. 李… III. ①半山类型-彩陶-研究 ②马厂类型-彩陶-研究 IV. K876.3

1999. 8. 26
考古书店

书 名: 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

著作责任者: 李水城 著

责任编辑: 李卫东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767-8/K·252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邮编: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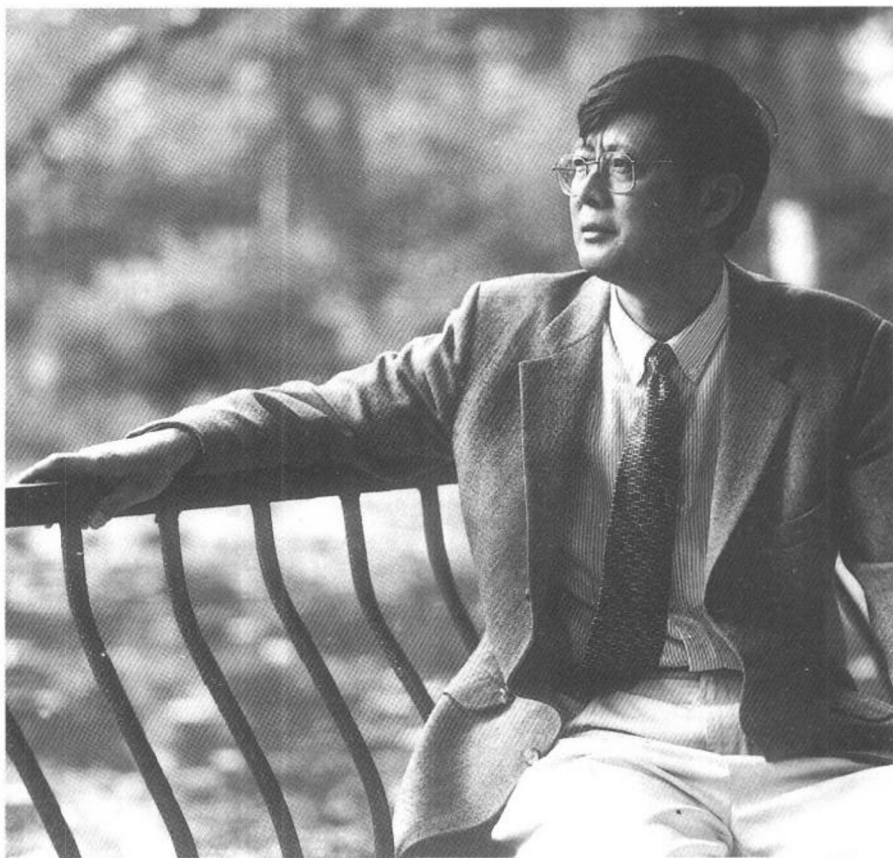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6.375印张 408千字

1998年12月第一版 199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作者简介

李水城，祖籍山西，1953年2月生于陕西，1969年初中毕业后任汽车电工九年（1970—1972年曾在甘肃师范大学外语系战备班学习俄语两年）。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2年毕业，分配到四川省博物馆工作，曾任该馆历史部副主任。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1988年获硕士学位，1996年获博士学位。现任考古学系副教授，系副主任。

1990年至今，主持和参与的科研项目有：“葫芦河流域的古环境考察”、“河西史前文化研究”、“赣东北史前稻作农业起源研究”、“长江三峡淹没区地下文物发掘与保护论证”、“中国西部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等。已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30多万字。

（摄影：祁庆国）

FH-44/26

教育部“九五”博士点重点资助项目

封面设计：冯先洁

序

严文明

在中国史前文化中,彩陶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因素。从1921年发现第一批彩陶算起,至今已经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了。在这个期间发现的彩陶遗址不下数千处,彩陶遗存之丰富与谱系之繁复,在世界上无出其右。且中国彩陶发生甚早,在老官台文化和裴李岗文化时期便已露出端倪,其年代当不晚于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5000—3000年即进入兴盛时期,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两湖地区的大溪文化、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乃至广东地区的咸头岭文化或大湾文化都有非常发达的彩陶。到公元前3000—2600年左右,上述大部分地区的彩陶进入衰落时期,再往后就没有彩陶了。不过福建和台湾的彩陶在较晚时期出现后还延续了一个时期;而甘肃、青海彩陶的发达期相对滞后,在一个短短的衰落时期之后又出现一个复苏期,延续到东周时才逐渐消失。新疆彩陶出现和消失的时间都比甘肃、青海为晚。

中国史前彩陶如此丰富,而深入的整理研究并不很多,有必要组织人力有计划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有鉴于此,所以当确定李水城博士论文的选题时,我特地提议他研究半山、马厂的彩陶,他欣然接受了,并且就他的能力所及做了最大的努力。博士论文通过之后,他又做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使内容更加充实,学术水平更加提高,这便是本书产生的原委。当初之所以选择半山、马厂的彩陶进行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我国所有彩陶文化遗存中,半山、马厂的资料最丰富、最集中,过去的研究也多少有些基础;二是李水城在甘肃做过多年工作,对半山、马厂彩陶的资料比较熟悉,研究起来不至于过分费力。现在看来,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半山、马厂彩陶最初是1923—1924年在甘肃和青海发现的,全部资料由巴尔姆格伦整理研究后发表了《半山及马厂随葬陶器》(《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三号第一册,1934年)一书。巴氏在该书中以甘肃宁定半山区边家沟大墓和青海民和马厂塬个别墓葬所出陶器为基础,对当时征集和收购的大量彩陶进行鉴别归类,进而从形制、花纹和制法等几个方面分析两种彩陶的基本特征、异同和相互关系,使人们对半山、马厂彩陶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比起当时一些学者的那种不着边际的比较研究,例如阿尔纳在所著《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二册,1925年)一书中所作的那样,要扎实和有价值得多。但那本书出版到现在也已经过去60多年了,在这个期间发现的半山、马厂彩陶比以前不知增加了多少倍。以前半山、马厂的彩陶全部出自墓葬,以至于发现者安特生还曾经以为这两种陶器是专门为死人随葬用的。而后来在甘肃兰州青岗岔等遗址的房屋中就出了不少半山式陶器,马厂式陶器出于居住遗址中的情况就更多了。即使出于墓葬的陶器,以前的资料极少是经过科学发掘的,

失去了许多有用的信息;然而从 50 年代起,我国的考古学者有计划地发掘了许多墓地,包括像青海柳湾等包含半山、马厂等多种文化遗存的大型墓地。这样就不只是获得了大量的器物,而且知道了器物在墓葬中的共存关系、某些墓葬的叠压打破关系、墓地中各墓葬的排列状况以及墓地与居住遗址的关系等重要资料。现在来研究半山、马厂的彩陶,就不会像过去那样单纯用器物学的方法研究器物,而可以用地地道道的考古学方法来研究器物了。就半山、马厂两类遗存来说,现在不但可以进行比较确切的划分,而且可以对它们各自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期与分区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先行的马家窑—小坪子类型和后来兴起的齐家文化与四坝文化的关系,自然就有可能获得比较接近于实际的认识。再者,我国从 60 年代以来开展用碳十四方法测年的工作,陆续公布了上千个史前文化的绝对年代数据,包括半山、马厂的年代数据,加上大量文化遗址的发现,使我们有可能建构整个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明确各类文化遗存的历史地位及相互关系。所有这些进展,使得半山、马厂彩陶的研究有可能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本书全面回顾了半山、马厂彩陶研究的历史,并且以大量的篇幅分别考察了半山、马厂两类彩陶的器形、花纹,进行了详细的类型学分析。同时考察了器形与花纹的关系,分析了不同器形与花纹的组合在时空框架上的位置,从而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期。在分析彩陶花纹时,突破了过去研究中往往只注意主体花纹而忽视配套的其它花纹,更不注意花纹在器物的不同部位上的变化的那种倾向,将多数器物上的花纹分为颈部花纹、腹部花纹和内彩花纹来分别加以考察;而每个部位除主体花纹外还注意配套花纹,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中可以获取更多的历史、文化信息。实际上任何彩陶花纹,都可以分为元素、母题和构图三个层次来进行分析。所谓元素是指构成花纹的最基本的形体,无非是点、线(宽一些就是条,再宽一些就是带,包括直的和各种弯曲形的)、块(三角形、方形、圆形、半圆形以及各种几何形实体)之类,也包括它们的颜色。例如锯齿纹就是半山彩陶的基本元素之一,而黑边紫色条带则是马厂早期常用的元素之一。本书对母题和构图分析较为详细,对某些元素的来源也进行了考察。例如他认为半山彩陶中的红色线条和锯齿纹元素可能是来自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内蒙古地区的史前文化,便是一个颇为新颖的见解。

本书在对半山、马厂彩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甘肃、青海地区确实存在着文化西渐的现象,并且考察了造成这一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自然环境变化的原因。对于彩陶产生与消亡的原因、彩陶器形与花纹的辩证关系以及彩陶花纹演变的一般规律等过去多有争论的问题也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是值得一读的。

中国史前文化的彩陶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需要从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和美术史等各种角度去进行发掘和研究,但首先需要进行考古学的基础性研究,包括分文化类型的研究、分区分期的研究、专题性研究、综合性研究和比较考古学研究等等,都要花大力气去做,半山、马厂彩陶的研究应该是这一宏传工程的组成部分。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把我国史前彩陶的研究沿着科学的轨道切切实实地推向前进。

1997 年 12 月 15 日

目 录

绪论	(1)
陶器与彩陶	(1)
半山与马厂的发现与研究	(3)
较量——“西来说”与“西渐说”	(4)
半山典型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6)
正式发掘的半山类型遗址	(6)
有重要采集品的半山类型遗址	(11)
半山时期彩陶典型器形态与谱系	(13)
彩陶典型器形式划分原则	(13)
彩陶典型器形态与谱系	(13)
半山时期典型遗存彩陶器形、组合分析	(29)
半山类型彩陶花纹形态与谱系	(35)
半山类型彩陶的界定	(35)
颈部典型花纹形态及谱系	(36)
腹部典型花纹形态及谱系	(43)
内彩典型花纹形态及谱系	(69)
半山时期典型遗存彩陶花纹、组合分析	(74)
半山类型彩陶编年及时空框架	(86)
典型器分组	(86)
典型花纹分组	(87)
器形与花纹的对应关系	(88)
半山彩陶的阶段性变化	(88)
时空框架及阶段性文化特征	(95)
马厂典型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100)
正式发掘的马厂类型遗址	(100)
有重要采集品的马厂类型遗址	(105)

马厂时期彩陶典型器形态与谱系	(106)
彩陶典型器形式划分原则	(106)
彩陶典型器形态与谱系	(106)
马厂时期典型遗存彩陶器形、组合分析	(131)
马厂类型彩陶花纹形态与谱系	(139)
马厂类型彩陶的界定	(139)
颈部典型花纹形态及谱系	(140)
腹部典型花纹形态及谱系	(143)
内彩典型花纹形态及谱系	(165)
马厂时期典型遗存彩陶花纹、组合分析	(173)
马厂类型彩陶编年及时空框架	(176)
典型器分组	(176)
典型花纹分组	(176)
器形与花纹的对应关系	(178)
马厂彩陶的阶段性变化	(178)
时空框架及阶段性文化特征	(183)
半山与马厂时期的制陶工艺	(188)
半山时期彩陶的制作	(188)
马厂时期彩陶的制作	(191)
从彩陶看半山与马厂的时空框架	(193)
半山类型的来源	(197)
马厂类型的流变	(199)
半山与马厂彩陶的历史地位	(201)
文化“西渐”——历史的大趋势	(202)
黄土的儿女——彩陶与黄土地带及旱地农业的关系	(205)
共时性与多元性——关于彩陶花纹演变规律的讨论	(208)
附录一	(211)
附录二	(218)
附录三	(219)
注释	(229)

参考文献	(240)
英文目录	(247)
英文提要	(249)
后记	(252)

绪 论

陶器与彩陶

陶器发明于史前时期,是新石器时代到来的标志之一,也是人类定居生活的产物。陶器发明后,作为一种应用面广泛的日用消费品,迅速参与并作用到人类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在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有着极其悠久的陶器生产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历代的能工巧匠们制作出大量美观实用、工艺精巧的陶制品,并难得地保留到今天,成为世界历史文化宝库中一笔珍贵的遗产。

陶器是利用自然界蕴藏的普通易熔粘土为原料,经过人为的开采、分选、浸润、淘洗、沉淀(发酵)、捣练、制坯成型、晾晒脱水等多道复杂的工序,再放入窑炉内用火加热焙烧,最终获得具有稳定性良好、不变形、具有一定抗压力的器皿。此即我国明代科学家宋应星^[1]在《天工开物·陶埴》中总结的“水火既济而土合”的陶器制作过程。关于陶瓷器的制作他还谈到:“一杯(陶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2]可见陶器的制作工艺是非常复杂的。

制作陶器所用的粘土成分主要是硅和铝,它无毒、无味,可塑性良好,是制作各种生活用具的良好材料。从各项工艺指标看,陶器坯体一般尚未烧结,无透明性,有气孔和明显的吸水性,可经受轻微的机械冲撞力,其硬度、密度明显低于后世出现的瓷器。由于陶器硬度偏低,易破碎,这也造成了陶器使用周期短、外形变化快、时代特征突出等特点。通过对陶器形态、组合及装饰花纹等方面的研究能够敏感地捕捉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文化特征及时空变化。因此,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对古代陶器均予以特别的关注,陶器也因此成为考古学文化分期、年代学比较和跨文化研究的基本素材。

现有资料尚难以证明陶器是怎样发明的。早在 19 世纪,已有一些人类学家注意到,最早的陶器可能是人们将泥土涂抹在竹木编织物或木质容器表面、经火烧灼发生变化偶然得之的。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Tylor E. B.)在《人类远古史研究》一书中谈到:“戈奎(Coquet)于上一个世纪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发明的过程。他说,人们先将粘土涂在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粘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3]戈奎还提到,1503 年游历过南美洲东南海岸的冈内维勒(Gonneville)船长见到“土著家里的土制容器,甚至烹煮食物的壶罐,都涂着足有一指厚的某种粘土,用以防止被火烧毁”^[4]。泰勒在同一本书中还讲到:“在没有陶器以前,人们烹煮食物的方法很笨拙,其方法是:把食物放在涂着粘土的筐子里,或放在铺着兽皮的土坑里,然后再用烧热了的石头把食物弄熟。”^[5]上述民族志资料说明,如果人们将涂有粘土的篮子、筐子放在火塘旁,其有机质部分经常会被火焚毁,而涂在有机质表面的泥土则保留完好,当这种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人们便注意到粘土经火烧会硬化、固化,由此刺激了陶器的发明。但研究者也注意到,美洲印

第安人发明陶器的民族志案例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在以后的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中均未找到类似的证据。因此,有学者提出,最古老的制陶术应是1843年马克西米林(Maximilian)在曼丹(Mandan)发现的一种直接成形法,其程序是先将粘土塞入一个粗糙的、近似于容器的模具内翻制锥形,一手持卵石垫在器内,另一手用木棒从外侧拍打,使器壁加固、定形。从制陶工艺的发展进程考察,这种被称为“模制法”的制陶术与人类初始阶段的技术水平相适应,很可能揭示了人类早期制作陶器的基准方法^[6]。

陶器是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最早利用热能改变一种物质的化学性质,能动创造的人工产品。一般而言,陶器的发明与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实行定居、从事农业生产有必然联系。在中国古史传说中就有“神农耕而作陶”^[7]、“舜耕历山……陶河滨”^[8]的记载。考古发现证明,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一般都是先有农业,而后才发明陶器。但也有一些例外^[9]。

制作陶器有一道重要工序,即器表装饰。在陶器发生之初,工艺原始、粗糙,一般不加装饰,但器表常常会留下一些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与增强器皿质密度有关的纹饰。随着技术的进步及人类审美意识的加强,逐渐开始对器表进行刻意装饰。总体看,陶器装饰分两大系统,一种在制坯过程中进行,用专门的工具在器表拍打、滚压、戳印、堆塑各类花纹(如绳纹、篮纹、方格纹、戳印纹、附加堆纹、刻划纹等),此类纹样的功能主要是强化陶器胎骨的质密度,利于陶器的烧成和使用,也有的兼具装饰性。另一类是将彩色颜料用“笔”在器表绘画各种花纹,此即彩陶。彩陶又分为彩陶、彩绘陶,前者是将花纹绘画在制好的陶坯上,经入窑高温焙烧,颜料牢固地附着于器表。后者是将陶器烧成后,再在器表绘制花纹,颜料的附着强度不如前者牢固。从时间看,前者出现早,后者出现晚。

中国有着悠久的制陶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9000—7000年),在西北渭河流域和陕西南部的汉水上游便出现了彩陶^[10],尽管花纹图案很简单,但意义重大,它表明黄河流域彩陶出现的时间与世界上其它几个文明古国是同步的^[11]。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7000—4000年),彩陶这一文化特质迅速传播,扩展到大河上下、长城内外、长江流域和华南沿海一带,但黄河流域一直是彩陶最发达的地区。大约距今5500年以降,各地的彩陶普遍衰落下去,唯独黄河上游地区是个例外,那里的马家窑文化^[12]彩陶特别发达,不仅数量超乎寻常的多,工艺水平也发挥到极致,这一文化现象的背后或许隐含着某些我们今天还不十分了解的、更深层次的原始宗教情结,但直接的流露是黄河上游地区远古居民对彩陶艺术的情有独钟。正是由于马家窑文化对彩陶的大力张扬,使得这一原始艺术门类在我国西北地区持续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随着马家窑文化的不断“西渐”,彩陶工艺也随之西迁,并最终对新疆东部地区的古代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书研究的是史前时期广泛分布在我国西北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距今5300—4000年)半山、马厂两个类型的彩陶。按照考古学的研究,马家窑文化分为三个类型,即早期的马家窑类型(距今5300—4650年),中期的半山类型(距今4650—4300年)和晚期的马厂类型(距今4300—4000年)。

半山与马厂的发现与研究

甘肃、青海两省地处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这里是中国田野考古工作起步最早的地区之一。1923年春,经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和地质调查所批准,由瑞典科学研究会资助,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博士(Andersson J. G.)^[13]前往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当年,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就在西宁河谷(湟水上游)、青海湖沿岸及贵德谷地发现一批古遗址。1923年12月和1924年3月,经英国传教士乔治·安德鲁(Andrew G. F.)介绍,安特生在兰州购买了一大批出自洮河谷地的史前陶器,其中,有相当一批精美的彩陶,尤以半山、马厂时期的最多。随后,他与助手进入洮河流域,调查了13处史前时期的遗址,并对个别遗址做了发掘。同时他还派助手前往碾伯县(今青海乐都)收购陶器,在享堂(今民和县)一带发现了史前时期的墓葬并收购到一些陶器。从1923年春至1924年,安特生在甘青两省共发现史前至青铜时代遗址49处^[14],其中,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有:甘肃宁定(今广河县)半山遗址和碾伯的马厂塬(今属民和县)遗址(也有作马厂沿、马厂垣)。

1925年,安特生在其所著《甘肃考古记》中简要报道了西北之行及收获。根据此次调查所得,他将中国西北地区的史前文化分为6期^[15],以半山遗址所出彩陶为代表,称“半山期”(当时归入“仰韶期”);以马厂塬遗址发现的彩陶为代表,称“马厂期”。

20年代中期,安特生返回瑞典,将他在西北所获半山、马厂陶器交助手尼尔斯·巴尔姆格伦(Nils Palmgren)整理研究。1934年,巴尔姆格伦著《半山马厂随葬陶器》一书出版,内容涉及半山、马厂时期陶器的制作工艺、器类形态、彩陶花纹等,对半山、马厂彩陶作了初步的界定、分期^[16]。该书对半山、马厂彩陶的界定基本成立,但分期结论缺乏根据,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客观地、历史地看,无论是安特生提出的“六期”说,还是巴尔姆格伦的半山、马厂陶器研究,均对中国考古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有关半山、马厂的研究基本停留在他们的认识水平上。

1945年春,夏鼐先生参加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发起的西北考察团,赴西北洮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发掘,通过此次工作,他认为“甘肃仰韶文化”与河南仰韶文化不同之处颇多,主张不如以临洮马家窑遗址为代表,称“马家窑期”或直呼“马家窑文化”^[17]。与此同时,裴文中先生通过在甘、青地区所作的考古调查,也意识到洮河流域的彩陶与渭河上游不无少别,认为这是仰韶时期一种有地方性质的彩陶,应以“马家窑式”呼之^[18]。但是,这一阶段安特生的观点还很有影响,马家窑文化长期被归入“甘肃远古文化仰韶期”,包括马家窑式陶器和半山式陶器,前者被认为是“仰韶期”人们的日常用具,后者是专为死者制作的随葬明器。

60年代初,有些学者逐渐开始将马厂类型陶器归入马家窑文化,这样,马家窑文化被扩充为拥有三个类型(或三个时期)的区域文化。但受材料限制,对这三个类型的关系问题仍意见不一,名称也很杂^[19],有学者将马家窑、半山视为两种并行的文化^[20],有的认为马家窑、半山、马厂三种类型的彩陶是一种地域性差别或不同部落使用的陶器^[21]。也有学者主张将半山、马厂从马家窑文化中分离出来,另立一文化或文化期^[22]。70年代末以来,随着新材料的增多,学术界一般倾向将半山、马厂看作是马家窑文化中、晚期的两个类型^[23],早期则以马家窑类型为代表。但仍有学者坚持半山、马厂是时间上并行、地域上分离的两个文化类型^[24],或直呼半

山文化、马厂文化^[25]。

较量——彩陶“西来说”与“西渐说”

苏秉琦先生曾指出：“中国彩陶成为学者研究专题差不多同近代中国考古发展史一样长，这说明它的重要性早就被人们认识到了。”^[26]事实的确如此，西方的田野考古学引入中国不久，有关彩陶的专题研究就开始了。1923年，安特生在其所著《中华远古之文化》一书中，将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所出彩陶与东南欧及中亚一带的特利波里(Tripolje)文化、安诺(Anau)文化作了简单类比，认为：“河南与安诺之器相较，其图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两地艺术彼此流传未可知也。诚知河南距安诺道里极远，然两地之间实不乏交通孔道。”仰韶村彩陶的发现“亦证东亚河南与西方安诺、脱里波留(特利波里)及欧洲之西西利曾有交通”^[27]。此时，有的外国学者甚至提出：“河南彩色陶器，其陶质形式花纹，与近东石铜器时代过渡期者同为一族。”^[28]在这些观点影响下，安特生在1925年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一书作了这样的总结：(1)甘肃地区的彩陶多于河南。(2)甘肃缺乏陶鬲一类代表中国文化特色的器物。(3)半山彩陶中的螺旋花纹与苏联特利波里文化相同。(4)齐家文化大双耳罐与希腊安佛拉罐相同。鉴于此，他认为：“彩色陶器之故乡乃近东诸部，为一般学者所承认者也。著者深觉精美陶器之有彩纹者，其制作之术，首抵甘肃，次及河南，此说固属无疑。”^[29]这一结论直接导引出了“中国彩陶源于西方”的错误认识。但同时安特生也感觉到：“由地理环境上之分析，确示新疆为吾人最后解决仰韶问题之地。”“此种文化(指仰韶文化)确实之发源地，非于新疆详加研究，不能判定。”^[30]

1926年，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发掘了西阴村遗址，根据这里出土的陶器，他认为：“考较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到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31]1946年，裴文中先生曾明确指出：“欲明了中国彩陶文化之起源，必先对世界上其它地域之彩陶文化详细加以研究。同时对于中国之彩陶文化当再作进一步的研究，推知其绝对年代。若中国之彩陶文化较它处之绝对年代为古，则彩陶文化起源于中国，然后传布至他处；反之，则中国之彩陶文化由他处传播而来。在此项研究未完成之前，而加推测，实属言之过早。”^[32]40年代末，有些学者通过夏鼐、裴文中等人在西北地区新获取的调查资料，感到中国彩陶文化有可能循“东来西向”的传播趋势^[33]。也有学者指出，安特生有关中国彩陶在各地的分布、年代排列及人骨研究之结果与“彩陶文化西来”的传播途径相抵牾，甘肃与河南彩陶完全不同，应代表两种不同文化^[34]。裴文中先生通过对新疆史前文化的研究指出：“安特生等谓中国之彩陶文化来自西方；但李济等则谓此彩陶文化发源于中国之中原(豫、陕、甘)，当为土著文化，并非由外界传布而来。若就现在所知，新疆彩陶文化分布及产物而论，李氏之说，似较近于事实，其理由有二：(1)新疆之彩陶，似为中国本部之彩陶文化期之晚期。(2)彩陶文化同时发现于天山南北，似由哈密而分南北二支，故其传布之途径，按地理而论，似由甘肃而来，至于哈密后，为天山所阻，而分向南北。反之，若此种文化由西而来，则由地理上观之，或只限于天山北路，未必能至天山南路。”^[35]由此，裴文中先生断言：“新疆之彩陶文化，实较黄河流域为晚，故由亚细亚传布而来之说法似有修正之必要。”^[36]以上诸家之说明明确表达出中国学者对“彩陶西来说”的怀疑和抵制。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开始了对“彩陶文化西来说”的批评，但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脉络到底怎样，却还没有人能够说的清楚。

1937年,安特生再度来华,认真了解了中国学者在30年代前期所做的一些工作,察看了部分新的出土文物,听取了一些中国学者的意见。他承认自己以往的工作有缺点,表示回国后对资料要认真核查。对“彩陶西来说”观点,他自己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最初他认为仰韶文化是中国的土著文化,后来受他人影响提出“西来说”,并成为他的关于中国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当他得知中国学者对此问题持不同看法后,进行了反思,后来还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1943年出版的《史前中国之研究》一书中,他写道:“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影响下,谈到什么把一种优秀文化带给中国统治民族的时候,那不仅没有根据,而且也是丢脸的。”^[37]

从50年代末开始,随着出土新材料的积累,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并着手探讨彩陶花纹的装饰部位、花纹演变序列、花纹母题分类及某些图案的象征含意等^[38]。

1965年,苏秉琦先生通过研究仰韶文化彩陶花纹的变化指出:“仰韶文化遗存在甘肃境内的移动方向是自东部到中部;马家窑文化出现时间较早,同仰韶文化联系比较密切的马家窑类型遗存的移动方向也是自东部到中部;……出现时间稍晚的半山、马厂类型遗存,则是自中部向西延伸到河西走廊的西端。”^[39]1978年,严文明先生就甘、青地区彩陶的源流、不同时段的花纹特征及风格流变等做了细致的梳理和深入讨论,初步归纳出,中国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是从东向西不断扩散的,年代学的检测结果亦证实“西渐说”是可信的^[40]。1982年,陈戈先生研究了新疆地区出土的彩陶,得出这样几点认识:一、从空间看,新疆彩陶的分布基本沿古代交通线连成一线,以东疆最为密集,愈向西数量愈少;二、从时间看,以新疆东部吐鲁番一带最早,愈向西愈晚;三、新疆发现彩陶与甘肃所出彩陶多有相似,尤同河西走廊最为密切。进而由此推测,距今3400年左右,彩陶经甘肃河西走廊进入新疆东部,春秋战国时期扩展至新疆中部,汉代前后,彩陶才最终在新疆绝迹^[41]。

近十年来的新发现表明,马厂类型的彩陶在甘肃西部逐步演变为四坝文化,该文化控制着河西走廊中、西部的广大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800年或稍晚,四坝文化越过星星峡进入新疆东部的哈密盆地,对东疆一带的青铜时代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42]。至此,除某些具体细节尚有待考古新发现充实外,有关中国彩陶源流之大轮廓的建构已基本告一段落。

半山典型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1924年春,安特生在甘肃宁定(今广河县)发现了半山遗址群,这里位于今广河县城东南、洮河西岸八阳河以北的黄土丘陵上,在不很大的范围内分布着数处遗址,包括瓦罐嘴遗址、半山墓地、边家沟墓地、王家沟墓地以及半山以南、瓦罐嘴以东的另一处墓地。安特生在当地曾收购流散的彩陶100余件^[43],并与他的助手在边家沟遗址发掘了一座半山时期的墓葬(即边家沟大墓)^[44],此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圹,无葬具,墓主单人侧身屈肢,头向东南。墓内随葬陶器12件,其中8件为彩陶,均绘黑红复彩,有发达的锯齿纹,与半山及周围遗址所出彩陶风格一致。后来的“半山式”陶器、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均由此得名。

早在半山遗址发现之前,即1923年9月,安特生和助手在西宁以西约13公里的湟水西岸就发现了朱家寨遗址。10月开始发掘,共清理墓葬47座(编号M1-47,其中,M2分A、B两墓),这批墓葬以单人二次葬为主,也有侧身屈肢葬、仰身直肢葬及合葬。墓主头向多朝北或略偏东,随葬陶器很少。从1945年出版的报告看,发掘相当草率,出土遗物分为五类,包括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和卡约文化^[45]。该址共发表彩陶20余件,约半数属半山类型。

自安特生在西北考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有关半山类型的遗存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发现。五六十年代,甘、青地区的考古工作主要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有一些小规模的投资、试掘。70年代以后,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逐渐增多。据目前掌握的统计资料,迄今为止,半山类型遗址已累计发现183处,涉及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省区,以甘、青两省为数最多,达174处^[46]。上述遗址中仅有少部分做过正式发掘,现将其中较为重要的发现介绍如下(依发现、发掘年代之先后)。

正式发掘的半山类型遗址

1. 青岗岔遗址^[47]

青岗岔遗址位于兰州市以北15公里的西果园乡青岗岔村西岗家山,历史上曾做过多次调查。1945年春,夏鼐和凌洪龄首先发现这一遗址,并采集有标本,认为这里“似乎是马厂期的葬地”^[48]。1947年秋,裴文中先生来到青岗岔调查,认为这是一处“仰韶时期之葬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半山遗存被归入“仰韶时期”)^[49]。1958年,甘肃省博物馆再次进行调查,确认该遗址还包含有半山时期的墓葬,第一次证实半山时期的遗址与墓葬并存^[50]。1959年,上海博物馆马承源先生也曾到该址调查^[51]。

1963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与甘肃省博物馆联合对青岗岔遗址进行发掘,清理半山时期房屋基址1处、窑穴2座、陶窑1座、墓葬1座,墓主系二次葬,无随葬品。1号

房基是一座面积 48 平方米的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大致呈坐西向东的布局。屋内出土可复原的陶器 12 件,其中 3 件为彩陶。另有残破彩陶碗 2 件、彩陶罐 2 件、彩陶盆 1 件(均未发表)^[52]。尽管该址出土彩陶数量不多,但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说到这里还要提到瑞典人安特生,当年他在考察洮河流域后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临洮马家窑遗址发现的彩陶均绘黑色单彩,广河半山区一带发掘、购买的彩陶全部绘黑红复彩,流行锯齿纹,这两处遗址后来均被并入“仰韶期”,那么,如何解释同一时期存在的两种风格迥异的彩陶呢?鉴于半山遗址及周围所得彩陶与边家沟大墓所出随葬品一致,安特生以为,半山区所出黑红复彩、带锯齿纹的彩陶应该是专为死人随葬使用的明器,锯齿纹是一种特殊的、与葬礼有关的“丧纹”,而马家窑遗址所出的黑色单彩陶器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实用器^[53]。50 年代以后,有些学者感到安特生的“驻地说”、“葬地说”理论缺乏事实依据^[54],但又缺乏过硬的材料予以驳斥。青岗岔遗址发掘的价值就在于首次在这里发现了半山的房屋建筑,证明半山时期是有聚落的。特别是在 1 号房基内还出土有绘黑红彩漩涡纹、锯齿纹发达的彩陶;遗址文化层和其它遗迹单位也出土有这种绘锯齿纹的彩陶片,这一发现对否定“丧纹”说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从此再也不能说半山式彩陶是专为死人随葬的了。通过这次发掘还证实,青岗岔遗址包含有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三个不同阶段的遗存。

1976 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再次发掘了青岗岔遗址^[55],共清理半山时期房基 3 座,墓葬 3 座。房屋有两座保存较好,均系半地穴式建筑,平面方形或不规则长方形,一座面积 16 平方米,另一座面积 45 平方米,均为坐西朝东的布局。两座竖穴土坑墓,无葬具,一座头向西,一座头向北,墓主均仰身直肢,随葬品仅有白色石块。另一座为儿童瓮棺葬,瓮棺顶部随葬 1 件彩陶。此次发掘有如下收获:①遗址中所出陶片约四分之三为细泥陶,而细泥陶多数系彩陶;②彩陶器主要有壶、罐、瓶三类;③彩陶器表多施陶衣,以橙红色居多;④彩陶均绘黑红复彩,流行锯齿纹;⑤该址第七探方下层所出彩陶圆圈纹较小、黑彩带纹较宽粗、锯齿纹较大,接近地巴坪彩陶作风。上层所出彩陶锯齿纹小、排列细密。据此,发掘者认为青岗岔遗址的时代晚于地巴坪,属半山类型晚期,与兰州沙井驿^[56]遗址同时。

2. 鸳鸯池遗址

位于甘肃永昌县东北约 20 公里的金川河西岸。1973 年 5 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对该址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 151 座。1974 年再次发掘,清理墓葬 38 座(两次发掘编号 M1—189)。据随葬品可认定,半山时期墓葬仅有 7 座,这几座墓多集中于墓地西南角,结构为竖穴土坑式,无葬具,墓主单人仰身直肢,头向东南。共出土陶器 31 件,含彩陶 9 件^[57]。1974 年的简报报道了第一次发掘收获,认为:①鸳鸯池墓地属马厂类型,但所出彩陶器形、花纹及葬式与以往发现有所不同;②半山、马厂的碳十四数据年代接近,二者应为同时期遗存^[58]。

1982 年正式报告发表,披露了该墓地发现的两组打破关系,均系马厂墓打破半山墓,首次提供了半山早于马厂的层位证据。据此,发掘者将该墓地分为三期:早期属半山类型,特征是流行单人葬,随葬彩陶以单耳长颈瓶、双耳罐居多,绘黑红复彩,花纹中有锯齿纹或由锯齿纹演变的短条纹,有浓厚的半山晚期特征;中、晚期属马厂类型。报告对简报的结论做了修正,认为马厂是半山类型的继续和发展^[59]。

3. 地巴坪遗址^[60]

位于甘肃广河县城东南 6 公里、广通河南岸地巴坪村附近的台地上。1973 年 6—12 月,